中国加入 WTO 后的外贸、外资形势及中期走势

中国加入 WTO，无论是对世贸组织的发展而言还是对中国自身的改革开放和发展而言，都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中国加入 WTO 后，按照 WTO 规则和我国与有关国家双边谈判协议的承诺，中国国内市场将更加开放，在国际市场上也将获得对等的待遇，中国的投资环境特别是法制、体制、政策等“软环境”将大大改善，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一、中国加入 WTO 后的外贸形势和发展趋势

中国加入 WTO 后，进出口贸易将全面纳入世贸组织规则的框架。国外产品将在大大降低贸易壁垒的条件下，按照非歧视原则、市场开放原则和公平竞争原则更为便捷地进入国内市场；国内企业也可以在世贸组织各成员国市场获得无条件、多边、稳定的最惠国待遇以及国民待遇，对大多数发达国家出口工业品和半制成品可以享受普惠制待遇，并享受世贸组织其他成员开放或扩大市场准入的便利。我国还可享受到世贸组织发展中国家成员的大多数优惠或过渡期安排，可以参加多边贸易体制的活动并获得参与制定国际经贸规则的决策权，享有世贸组织成员运用规则和例外条款、保障措施的权利，并可利用解决贸易争端的机制维护本国企业正当利益。所有这些，必将促使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量持续较快增长，贸易结构不断优化，并加快贸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易增长方式的根本改变。

加入 WTO 后，我国对外贸易形势和中期走势将出现五大变化：

——进出口贸易平衡关系将发生新的变化。加入 WTO 之初，进口增长将快于出口增长，但仍有可能保持进出口基本平衡。这首先是由于目前美国、日本、欧盟三大发达经济体同时陷入衰退或低迷，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明显放慢，国际经济环境比亚洲金融危机时更为严峻。2001 年我国出口增长率将由 2000 年的 27.8%降到 7%左右，2002 年能增长 3%～4%已属不易。预计世界经济有可能在 2003 年出现复苏，在此之后，我国加入 WTO 带来贸易环境改善的积极效应才会明显地表现出来。其次是因为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某些产品出口仍然受到一定限制，如纺织品出口配额限制尚未取消，美国仍可实施针对我国出口产品的为期 12 年的特殊保障措施，采取反倾销、反补贴行动时可以采用替代国标准，并把这种视我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办法执行到 2015 年。再次是由于我国产品出口过去主要依靠价格竞争力，而随着要素成本日渐上升、出口退税率已接近极限、人民币汇率稳定升值，以及某些不符合世贸规则的补贴政策必须取消，这种价格竞争力势必减弱。而通过调整结构、优化资源配置继续保持相对的价格竞争力和提高非价格竞争力则需要一个过程。与此同时，由于关税减让特别是非关税壁垒大幅度削减，我国一些不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进口冲击将迅速显现出来，估计在 2005 年前后达到高潮。预测“十五”期间我国出口可年均增长 6%左右，进口年均增长将在 10%左右，贸易顺差明显缩小，甚至个别年份可能出现少量逆差，但整个“十五”时期仍可望实现进出口基本平衡。“十五”以后，随着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重大进展和开放型的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益完善，我国出口增长的潜力将进一步发挥出来。

——进出口产品结构将加快调整优化。加入 WTO 后，我国中低技术的机电产品出口可望有更快的增长，如家用电器、一般机电设备、船舶、摩托车等，预计到 2005 年机电产品出口占全国外贸出口总额的比重将超过 50%。同时，电子通信设备、计算机及软件、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高技术产品也将随着中间投入品进口关税降低、本土配套率提高和逐步形成经济规模与开发能力而增强竞争力，预计到“十五”末期高技术产品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将超过 20%。仍然具有比较优势的轻纺产品和某些农牧渔产品也有扩大出口的潜力，但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会逐步下降。进口结构过去主要取决于国内供求平衡状况，今后这个因素仍然存在，但将会更多地受制于国内产品与国外产品相比较的竞争力。即不仅是国内供给不足的产品才会进口，有些产品虽然国内供给能力充足甚至已经过剩，但如果缺乏竞争力，国外产品也会进入国内市场。

——多种所有制的外贸经营主体将得到迅速发展。加入 WTO 后 3 年内，各种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均有权从事进出口贸易，各项政策也将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这将大大激发非国有企业经营进出口贸易的积极性，并促使国有外贸企业加快转变经营机制、增强竞争活力。1999 年以来，集体企业和私营、个体企业的出口增长速度已经远远高于国有企业和三资企业。2000 年集体企业和私营、个体企业的出口增长率分别为 55.4%和 177%，而国有企业和三资企业出口增长率分别为 18.2%和 34.8%可以预料，加入 WTO 后国有企业在关系国家经济安全和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商品进出口中仍将发挥主导作用，非国有企业将以较高的进出口增长速度改写他们在我国外贸事业中

的地位。

——进出口市场多元化将取得实质性进展。加入 WTO 为我国与世贸组织所有成员扩大贸易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同时，近几年来我国积极参与区域性多边合作组织的建设，如 APEC、中欧论坛、东盟十加三，不久前我国又与东盟达成了在 10 年内缔结自由贸易协定的共识，这些都为推进我国外贸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加入 WTO 后，我国出口产品将在继续巩固美国、日本、欧盟、港台等传统市场的基础上，积极向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东欧、中东、东盟、南亚、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拓展。同时，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及地区，以及体制转型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各自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都将更多地进入我国市场。

——各地区的外贸发展将逐步形成各具特色的竞争优势。东部沿海地区和一些比较发达的大中城市，将在增加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方面走在前列；一些非国有经济发展势头很好的地区，如浙江，将凭借灵活的企业经营机制成为出口贸易大省；中西部地区将随着自身经济结构调整和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进，逐步形成自己的经济特色和比较优势，从而使我国对外贸易显现出东中西部各展所长，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参与国际分工，发挥其动态比较优势的新格局。

二、中国加入 WTO 后利用外资的新形势和发展趋势

中国加入 WTO，必将带来新一轮利用外资的热潮。目前我国农业和制造业已经基本上对外资开放，加入 WTO 后，还将进一步开放基础设施和服务业。外商投资的法制和政策环境将大为改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提高，行政审批事项大幅度减少，

国内统一市场将加快形成并日趋完善，必然大大降低外资进入的交易成本和体制风险。外商投资企业将获得更充分的经营自主权，绝大多数投资领域将取消或放宽股比限制、并取消国产化比例和出口比例的要求，政府也不再干预外商与国内企业合资、合作的技术转让内容。所有这些，都会进一步增强我国对外资的吸引力。我国政治、社会稳定，国内市场广阔，经济正处于快速成长阶段，加上加入 WTO 所带来的投资‘软环境’改善，我国利用外资将进入一个新的快速增长期。美国高盛公司根据定量模型和经验判断，预测我国到 2005 年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可达到 1000 亿美元的水平，占世界 FDI（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的份额将由 1998 年的 4.5%上升到 6.3%。这个估计可能偏高。我们认为“十五”期间，我国年均吸收外商投资不低于 500 亿元，应是可能实现的。

中国加入 WTO 后，利用外资的结构和方式将在五个方面发生新的变化：

——外资的产业分布将发生较大变化。制造业仍将是吸纳外商投资的主要领域，但由于新一轮世界性产业结构调整和与之相关联的国际间产业转移的新趋势，以及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需要，制造业吸纳外资的重点将由前一时期主要在劳动密集型的轻加工组装业转向重化工业、深加工业和高技术产业。我国农业资源多样化，农村劳动力丰富且人工成本十分低廉，种植业和牧、渔、林业开发潜力都很大，目前农业利用外资还很少，加入 WTO 后，随着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有望较大规模地吸收外商投资。服务业引进外资的增长速度将超过制造业，银行、保险、证券、电信、商贸、旅游、运输以及各种专业服务，将成为外商投资的新热点。房地产开发和城市基础设施利用外资也将有新的发展。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外商投资的规模、地区结构将更趋合理，外资来源更为多元化。以往 20余年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 70％左右来自港澳台和国外华侨华人的中小资本，投资于劳动密集型的小型项目居多。今后，为发挥国际比较优势和缓解就业压力，利用我国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水平和要素成本落差较大的条件，积极发展符合国内外市场需要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产品，包括高技术产品的某些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和工序，仍是必要的和可能的。这类领域是港澳台和国外华侨华人中小资本的强项，他们在这方面的投资还会继续扩大。同时，加入 WTO 后,大跨国公司将会纷纷进入我国，他们着眼于全球经营战略，主要投资于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大型基础设施、高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达国家一些拥有专利技术和专业化生产优势的中小企业，也会到中国来寻求投资机会和合作伙伴。因此，中国加入 WTO 后外商来华投资的规模结构将呈现大项目增多、平均规模扩大、大中小项目并举的发展趋势，外资来源将更加多元化，来自发达国家的外资比重将会明显提高。

——外商投资在我国的地区分布将由南向北、由东向西进一步扩展。目前外商在我国的直接投资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区，尤其集中于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加入 WTO 后，东南沿海地区具有优越的区位、比较完备的基础设施和先行改革开放的体制优势，仍将受到外资的青睐。特别是上海及其周围地区，由于原有产业基础雄厚，科技、教育发展水平较高，社会信用、市场秩序、行政效率等投资软环境因素相对较好，吸纳外商直接投资很可能跃居全国最前列。同时，环渤海地区、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重化工业和大型国有企业集聚的地区，在我国加入 WTO 后也将为新一轮外商投资热潮所看好。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动下，中西部地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加强基

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大力发展科技教育，投资环境将有较大改善。加之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有些投资领域的外资准入条件比东部地区更为宽松，政策也更为优惠，可以预料，今后中西部地区吸收外资将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在全国利用外资总量中的比重会逐步有所提高。

——外资将更广泛地参与国有大企业的改组改造，并与更多的非国有、非公有内资企业相融合。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对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特别是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实行产权多元化和股份制改组改造，必然会吸纳更多的外资参与进来。外商投资特别是跨国公司的战略投资，也必然会把参与国有大企业的改组改造作为他们的重要选择，包括用并购方式将我国企业纳入其全球生产经营体系。同时，非国有、非公有企业为适应国际竞争的需要，也将积极寻求外资参与，特别是一些成长较快、规模较大的非国有、非公有企业和科技创新型民营企业，将成为外商关注的投资对象。

——利用外资的方式将更加多样化。我国加入 WTO 后，除了继续以原有的方式吸纳外商直接投资，还将进一步推动国内企业到海外上市，允许外资收购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的不良资产，逐步放开跨国企业并购和外资参与国内产业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至于开放资本市场，则不属于世贸组织管辖的范围，也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创造条件和更为谨慎地稳步推进,但加入 WTO 后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客观上也会对最终开放资本市场起到推动作用。

因势利导，加速战略性调整

“9·11”美国遭到国际恐怖主义严重打击和随后的报复行动，使人们对国际经济的预期更加悲观。一些学者认为我国经济的基本走势将在 L 型底部继续盘整，未来几年都可能是 7% 左右的增长速度。人们对启动内需信心不足，靠积极财政政策保七，靠外需争八，经济调控过于偏重近期目标和适应性措施。这种思路不变,就难以打开新的局面,也可能‘十五’时期的实绩就是如此。但换一种思路，可能别有洞天。经济增长和运行态势不过是经济发展阶段性矛盾的外在表现。持续多年的低速运行，不是短期适应性调控措施不得力，而是对主要结构性矛盾重视不够，战略性调控措施不得力，思路尚不清晰。只要我们抓住主要矛盾，克服抑制内需增长的主要障碍，不仅会为我国经济长期发展奠定稳固基础，而且会对年度经济增长起到立竿见影的推动作用。

一、把社会保障、住宅、教育“三座大山”变为三大动力

工农两种生产方式、城乡两种社会结构的矛盾是我国现阶段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是我国诸种矛盾的总根源。按正常的经济规律，二元结构矛盾的转化要靠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促进城乡要素流通，调整城乡人口结构，减少农村人口,转化人多地少的矛盾,改造农业生产方式、农村社会结构，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由于在普遍规律和特殊国情结合上

左右摇摆，在强调中国特色的时候，忽视了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产生了一些白马非马甚至指鹿为马的糊涂观念。[50] 多年来，我们实际上走了一条分散工业化、工矿型城区化的发展道路。这样的发展道路极大地抑制了人口的集中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使城市化严重滞后，极度扭曲，使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上升到社会生活表面，直接表现为经济运行和增长的主要矛盾。一方面,城市经济在开放大潮中蓬勃发展,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新经济、全球一体化、率先现代化的躁动日益强烈 另一方面,广大农村居民购买力低下，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落后，消费结构升级困难，导致城市大量工业品过剩，大量工人失业下岗，需要政府接济的城市贫困人口有增无减。

现在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看到加速城市化是解决目前困境的惟一出路，是国民经济战略性调整的主要任务。而要加速城市化，和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从而实质性启动内需，就必须解决三大困难,搬开‘ 三座大山 ”——社会保障、住宅、教育。这三大难题既是城市化的门槛，又是启动内需的门栓。这“ 三座大山 ”实际上是当今中国的三大短缺，是被大量工业品虚假过剩掩盖的真正短缺。只要把闲置、浪费的社会资源向这三个方面转移少许即可解决问题。这就要从理顺大分配关系入手对社会保障、住宅、教育三大体制进行根本性的、实质性的改革。

(一)建立财政型基本保障体制

社会保障体制是市场经济的制度性前提。按要素分配是市场经济微观主体间最基本的经济关系和动力机制。资本和劳动力两大要素所有者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资本所有者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主导地位,劳动者只有被其雇佣,才能劳动,才能生存。按要素分配劳动者创造的全部价值，本质上是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资本所有者无偿占有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这是劳

资对立关系；把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以劳动力消费税的形式再分配给失业者提供基本生活保障，这体现劳资两者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使劳动力商品化、按要素分配成为社会通则的必要条件。如果这种统一性不稳固、不到位，劳动者就不会耗费全部工资，被迫从必要生活费中扣除部分费用，准备用于失业、养老时期的生存费用。这势必影响社会的即期消费，使市场需求不足，最后使按资本要素分配的剩余价值也得不到实现，企业效益下降、破产,工人失业,社会矛盾激化。

目前,银行 7 万亿元居民存款和内需不足、市场疲软并存，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和高度警惕。银行七次降息、政府开征利息税，居民还是义无返顾地向银行存款，这足以说明社会保障问题像一座大山压在他们心中，像一把利剑悬在他们头上。本来失业、大病、生活费不足,只是少数人、短期发生的事,社会保障作为公共品由政府提供，只需要全社会居民消费额的一小部分就够了。但是，家家户户都当做一种必然性来应对，都抑制即期消费，总量上就相当大了。现在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7 万亿元的社会保障的实际作用还不如作为公共品由政府提供的 3000 亿元社会保障可靠。极而言之，我国一年真花上 3000 亿元,解除了群众后顾之忧，居民一年少向银行存款就不止 3000 亿元,从银行提出存款也不止 3000亿元，这无疑会直接扩大内需 1 万亿元左右。如果自 1998 年起的积极财政政策几个 1000 多亿都用到社会保障上，内需早就启动了，国民经济运行的走势不会是 L 型,而会是 V 型。企业改革和城市化的速度可能更快一些。

现存的社会保障体制是一个分散、混乱、保障度极低的体制。表面看是基金不足，实际上是目的、对象、主体和资金来源都不清楚的一团乱麻。什么旧账新账、老人中年人，扯不断，理还乱。市场经济要求我们建立全社会统一的作为政府公共品的

社会保障制度。只要进入市场经济体系，劳动力转化为商品的劳动者都有权消费这个公共品。这个公共品的供给主体是政府，基金来源是劳动力消费税。因而社会保障资金应该纳入财政预算，没有必要建立什么个人账号和积累基金。对财政来说，实报实销，预算确定需要多少社会保障资金，就收多少劳动力消费税，年度调剂，不搞积累。对保障对象来说，他必须是一无所有的劳动者，个人有资产、有购买力，不是社会保障对象。社会保障资金是按需分配的，政府提供的只是个人支付能力和生存必需费用的差额，差多少补多少。我们这个思路和旧账一刀两断，简单易行，没有后顾之忧。

(二)建立以租为主的住宅流通体制

住宅流通体制不顺是内需启而不动的第二大障碍。由于现行住宅流通体制不符合我国目前的产权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严重阻碍了住宅产业的正常发展和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使广大居民买不起、租不起甚至住不起。为积累购房款抑制当前消费，省吃俭用地存款。在居民存款目的中买（建）房装修排在教育之后，居第二位。这是居民存款快速增加和内需疲软并存的重要原因之一。

住宅作为商品，具有资本品和消费品的双重经济属性。买房是投资行为，租房是消费行为。现阶段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中只包括房租，不可能包括房价。因为毕竟工资是有限的，不压缩即期消费，就没有余钱积累购房款。而压缩即期消费，必然使劳动力处于萎缩再生产状态。因此在正常的经济条件下，广大工薪阶层只能租房，不能投资买房。而我们目前的房改政策是以售房为主，政府廉租房不作为主要方向。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所谓房改房实际上是赠送大部分，个人拿小部分，机会并不均等，造成公有资产大量流失。许多人把这看做最后一次“瓜分”国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资产，而广大产业工人并不能从房改中受益。所谓经济适用房，既不经济，也不实用，价格高得普通百姓望房兴叹。有产阶层却将此看做是投资的大好机遇，开着轿车来买经济适用房，有的一买就是几套。现在，一方面广大消费者无房可租，有房买不起，一方面大量商品房积压（已有近亿平方米）。实践早已证明以卖为主的政策不符合劳动力再生产的规律，不符合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

另外,租、税、费、价合流,房价畸高,不符合我国现阶段产权结构，客观上牺牲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使少数开发商获得暴利，阻碍了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现在我国的住宅商品价格是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地价，实际上是 50 到 70 年的地租；二是城市配套费和各种税收；三是建安成本加平均利润。这三个部分反映了不同的经济关系，属于不同的产权主体。土地是国家所有,批租给开发商,把 50 到 70 年地租一次性计入房价，这等于让购买者一次性交 50 到 70 年的地租；税和费是使用公共品的成本，公共品的产权是政府的，本质上都是税，购买者也是一次性交 50 到 70年的税；只有建安成本加平均利润是应该一次性交的。这种把三种产权主体、不同周转周期的费用联体一次性交易流通的做法，是我国现阶段房价畸高的根本原因。如果土地不搞一次性批租，而是收年租、月租，一次性房价就会大大降低，开发商开工的门槛不就更低了吗，但倒地皮的二地主、三地主就发不了财了。这个秘密已被揭开十几年了，人人心知肚明，就是改不了。可见在我国代表落后生产关系的既得利益阶层已经形成，并很善于维护自己的利益。一个批租，使政府丧失土地经营权 50 到 70 年，但在这漫长的时间里，城市扩容带来的级差地租都归占用者所有，这是一笔巨额国有资产的流失。配套费也可以按年按月收，房价就可以大大降低了。我们完全可以采

取产权主体分立,租、税、费、价分流的住宅流通体制,房价可以降低到目前的一半左右,使大多数人能租得起,相当多的人能买得起。这样卡住消费结构升级的住宅问题就解决了。目前我国建筑材料、装修材料十分丰富，劳动力几乎是无限供给，一旦住宅流通体制走上正轨，住宅产品生产和消费就会蓬勃发展起来，将带动国民经济五十多个产业兴旺发达，引起就业岗位的增加，内需市场的繁荣，必将使国民经济发展上一个新的台阶。当然，即使在新的住宅流通体制下也会有相当数量的人租不起商品房住宅，对这部分人，政府应该提供以劳动寿命 40 年为回收期的廉租房。

(三)恢复义务教育公共品属性,加速高等教育市场化

教育体制改革滞后是抑制内需扩大、产业结构升级的又一重要原因。当前教育排在居民存款目的的第一位。据调查，家庭存款中 40% 多是为子女教育准备的。教育短缺，教育费用昂贵已是十几年来家家户户议论的重要内容。

我国当前教育体制的问题主要是义务教育市场化，非义务教育市场化不够。九年义务教育本应该是政府公共品。凡到义务教育年龄的人，都应平等享受九年初等教育的权利。而目前实际的情况是国家对城乡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差距很大，大部分财政教育拨款都集中在城市。而城市里的义务教育拨款又向少数所谓的重点学校倾斜，公共品缺乏公共性，使不该市场化的义务教育加速市场化。分槽饲养，把中小学分为三、六、九等,资金、设备、师资、生源,优上加优,劣上加劣。这种政策已持续多年，给幼小儿童心理造成难以弥补的伤痕。各个学校为了保持优势、争取优势，向家长伸手，五花八门的收费越演越烈。有钱才可以上好学校、上贵族学校，望子成龙的家长们，自己不吃不喝也要为孩子上好学校积累资金，向银行存款。从

幼儿园到初中毕业，这种把公共品商品化的所谓义务教育，给工作不久、工资不高、积蓄不多的年轻父母们造成沉重负担，使这些青年人心理浮躁，急功近利，事业心差，对他们的成长十分不利。

非义务教育市场化滞后，特别是大学教育，国家投资绝对量不大，但比重过大，没有当一个产业来对待，没有放开教育市场，社会投资进入不多。如果说教育短缺，最短缺的是大学教育。美国两亿多人,在校本科生 1400 多万,我国 13 亿人口，在校本科生只有 400 万左右。每年的高考竞争十分激烈，大多数考生上不了大学。分数线成了命运线，一分之差值万金，几乎影响人的一生。家长们存款的重中之重是为孩子上大学。如果适当压低分数线，每年扩大招生 100 万(这在我国不算多,十年也赶不上美国），家长们是会兴高采烈地掏腰包的。教育经费在哪里？就在家长们的腰包里，在银行的存款里。现在大学是严进宽出，为什么不可以宽进严出呢？现在大学是进门同考，出门分考，为什么不可以进门分考，出门分专业同考呢？大学毕业证由大学自己发放，专业从业资格证书由教育部门、劳动部门和行业管理部门考核后发放，教育质量是可以保证的。换一种思路，我国的教育事业就会迅速兴旺起来。教育短缺的局面一变，教育消费将释放出大量银行存款，死钱变活钱，拉动 GDP 的作用比外贸出口还要大。只要我们在教育方面的投入坚持公共品属性，使每个学生都享受同等的国民待遇，只要我们放开非义务教育市场，加速其产业化，不仅可以扩大内需，使居民消费结构升上一个新的台阶，而且可以扩大外需，搞教育出口。人力资本是第一国力，教育投资是只赚不赔的投资，在目前其他产业投资动力不足的情况下，政府主导应向教育倾斜，借机积累人力资本，这是理智的选择。

社会保障、住宅、教育三座压在内需上的大山，一旦换一种发展观，换一种思路，它们就会变成国民经济发展、GDP 增长的三大动力，三架马车，三个新的积聚度很高的增长极。只要我们办好这三件事，GDP 以 8% 以上的增长速度再维持 20 年是不成问题的。对于一个两元结构三七开的国家，8% 的速度不是高速度，低于 8% 的速度就是病态运行的表现。如果我国人口城市化率一年提高一个百分点，还需要 20 年左右才能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地位才能发生根本改变。只有二元结构矛盾转化为倒三七的时候，农业生产方式改造的任务才能基本完成，农业有机构成才可能接近工业。只有到那时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才能逐步降低，使国民经济由量的扩张为主向质的升华转变。

二、要因势利导，千万不要搞逆调解措施

从国民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出发看待经济运行问题，对经济运行走势的因果关系要有辩证思维，千万不要形而上学地压高拉低，搞逆调解措施，一定要因势利导，把战略性调整和适应性调节有机地结合起来。比如农民收入下降、物价稳中走低、外贸出口下滑、民间投资下降、居民存款增加过快等问题，都应该从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的高度采取应对措施，顺应市场调节之势，把握调整力度。

(一)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

当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我国目前不到 20 亿亩耕地，由 2 亿多农户经营，平均每户不到半公顷，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尖锐。在这种情况下，平均每个农户收入下降是正常的，是价值规律、市场机制分化小农户，推动农民离开土地、离开农村，进入城市，自发缓解人多地少的矛盾。从历史发展看

问题，这是城市化的动力、农业生产方式改造的动力，是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经济基础。

我们没有重视改变农业生产方式这件挖根工作，自觉不自觉地把农民稳定在农村，这是问题的关键。反映出农业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思想在相当多的干部头脑中还有根深蒂固的影响。从离土不离乡、就地搞工商，到遍地开花大搞小城镇，万变不离其宗，就是企图就地消化农民，不想让农民进现有城市，想过城市生活就在农村就地搞小城镇。

然而城市化的规律是不可抗拒的。农产品价格下降，农业收入下降，农民负担加重，民工潮汹涌澎湃。外出打工的农民越过小城镇、小城市、甚至中等城市,直奔大城市、特大城市。农民问题的实质是就业问题。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敞开门的小城镇、小城市他们进不去，留不下，层层设防的大城市、特大城市他们却无处不在。首都北京也有几百万农民工找到了工作，尽管许多人在感情上还没有接受他们，但客观上这些城市已经离不开他们了。目前千方百计到国外大城市谋生创业的农民日益增多，浙江温州农民已经在欧洲的大城市、国际性大都市站稳了脚根，打开了局面，闯出一片新天地。可见中国农村城市化的动力是何等的强大，中国农民要换一种活法，对城市，对获得新的经济资源、充分就业的要求是何等的强烈。城乡人口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运行的火车头，只要扫除一切人为的障碍，就可以支撑我国经济以较快的速度发展20年以上。因此，解决农民收入问题我们不能再走就地提高的老路，而要走异地提高的新路。只有靠加速城市化，减少农民，化农民为市民才能解决问题。无情的市场机制把农民从土地上赶出来，推向城市，有情的政府不能关紧城门，再不能把他们推回去。即使我们不主动拉，但也不能推，而是要积极开辟就业门

路，增加城市的吸纳力。农村的问题要靠城市来解决，农业的问题要靠工商来解决。这就是我们的对策结论。指导我们的哲学思想是时间的问题要靠空间来解决。两元结构的时代差异，要靠要素结构的空间转换来解决。

（二）物价低稳、企业效益下滑一定程度上可促进产品结构、产业结构调整

经济指标或高或低，只能根据国民经济发展中主要矛盾转化的走势来判断其经济意义，切莫见低就拉见高就压，这样容易犯逆调解错误。在正常的情况下，物价低稳，经济中速增长或高速增长都是健康的运行态势，是经济运行质量高的标志。在经济运行速度偏离自然增长率过大或过久的情况下，物价低稳是经济结构性矛盾尖锐化，市场机制在自发地调整产业结构的表现。

（三）要正确地看待当前出口下降的问题

我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大国，2000 年进出口已经占 GDP 的 40％多，外贸依存度已相当高，几乎是美国发烧我们就感冒。目前我国的出口已占 GDP 的 23％左右。内需不足，对出口依赖性就很大，为了刺激出口，退税率已高达 15％，空间已经不大。我国出口产品大多是劳动密集型、附加值低的产品，这些产品国内的潜在市场很大，只是购买力不足，被迫低价出口。产品质量提高、技术进步都是在激烈竞争压力下逼出来的，如果在现存生产结构、出口结构上出口增长率持续增高，结构调整升级是不大可能的。现在出口指标走低，正是调整国内产品结构、产业结构、出口结构的大好时机。外需不足是扩大内需的压力，是打破国内区域同构、区域封闭，实现国内市场一体化的动力。

多年来我们强调对外开放比较多，对内部开放不够重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